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政治学系列 ·

总主编 华世平

CAMBRIDGE

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

[美]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 (Adam Przeworski) 著

丁韶彬 译
吴 勇 校

人民大学出版社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

[美] 亚当·普热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著

丁韶彬 译
吴 勇 校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 / (美) 普热沃尔斯基著；丁韶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ISBN 978-7-300-15797-9

I. ①资… II. ①普… ②丁… III. ①资本主义—民主—研究 VI. ①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1066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

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

[美]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 (Adam Przeworski)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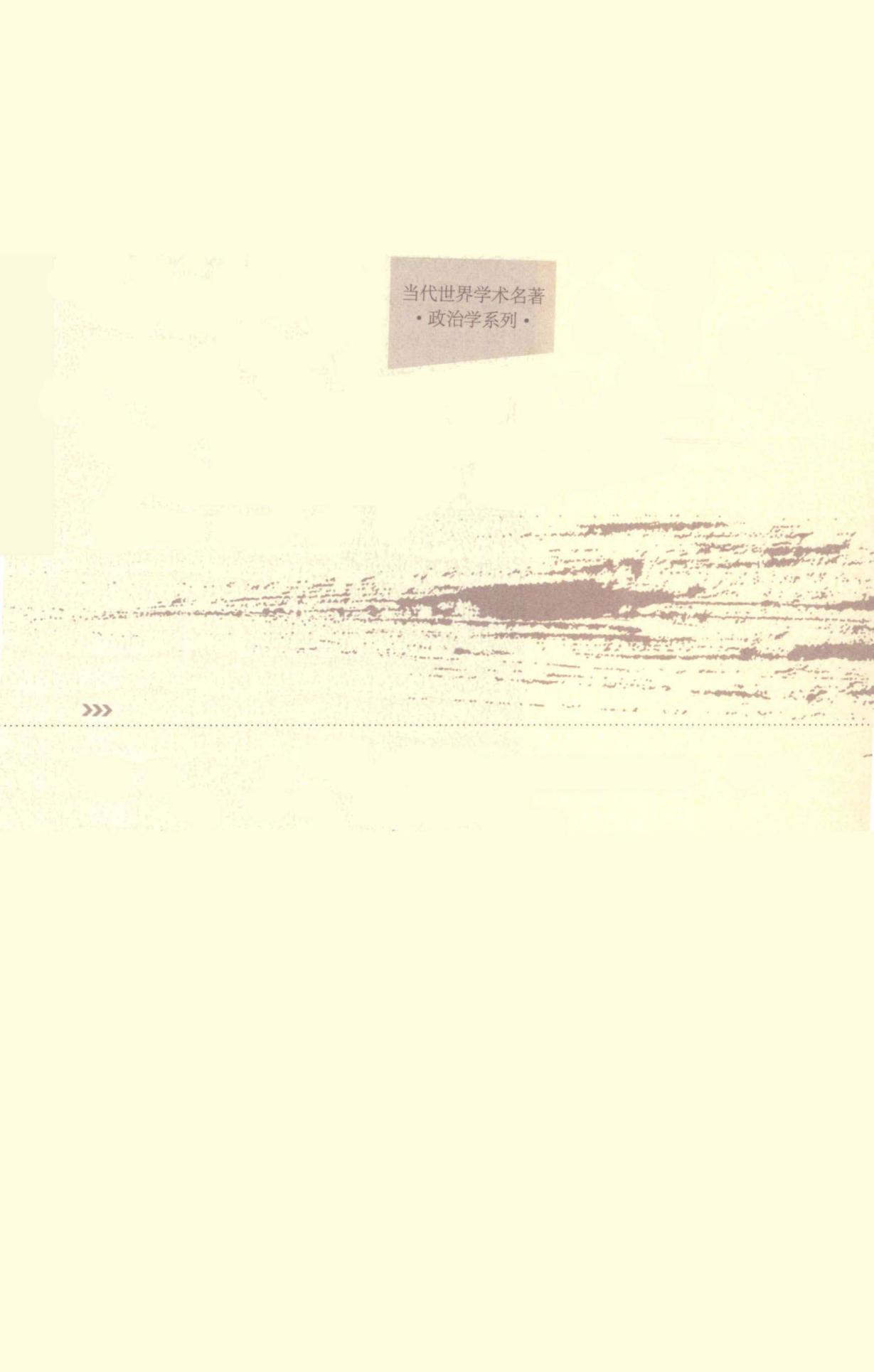
丁韶彬 译

吴 勇 校

Zibenzhuyi yu Shehuiminz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	19.25 插页 2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7 000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政治学系列 ·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华世平 (Shiping Hua, 美国路易威尔大学)

副总主编 吴勇 欧阳景根 郭晓明

编 委

王浦劬 叶自成 丛日云 朱光磊 任剑涛 刘德喜 李强

杨龙 杨光斌 张小劲 林冈 林尚立 金灿荣 周光辉

房宁 胡伟 贾庆国 景跃进 燕继荣

William A. Callaha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Lowell Dittmer,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ichael Fowler, 美国路易威尔大学

Peter Moody, 美国圣母大学

Lynn T. White,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Brantly Womack,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Quansheng Zhao, 美国美利坚大学

出版说明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在西方，有关政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阐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产生了十分丰富和系统政治思想，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治国理政的学说，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是 19 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

事实上，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起步并不算晚。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政治学课程开始在国内少数大学中讲授，如果从 1905 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只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短二十几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一度中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按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的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编写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学术专著，引进了一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政治学著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应当说，政治学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发展中的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特别是与邓小平提及的“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发展速度似乎更慢些，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似乎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既然中国现代政治学是由西方传入的，那么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当然，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其学术观点、理论预设等也不完全为我们所认同，但对处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政治学来说，以开放的思想对待西方的理论，通过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吸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自主创新，不失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条捷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国内外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诚协作，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政治学系列”。出版这套译丛，旨在将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学术著作系统地译介给中国读者，为国内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总的来看，这套译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权威性。所选著作均为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著作已经得到国外学界的一致认可，并在西方主流学界被反复引用。丛书作者包括罗伯特·A·达尔、塞缪尔·P·亨廷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安东尼·吉登斯、伊恩·夏皮罗、约瑟夫·S·奈、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个政治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这套译丛强大的作者阵容。

第二，全面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一些政治学著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但这种翻译出版不是系统性的，而是零散的。本套译丛是国内系统地、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政治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它试图涵盖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包括比较政治、政治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思

潮、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

第三，前沿性。本套译丛选择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如新制度主义、后行为主义、全球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等的著作，以期促使国内政治学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能较为及时地了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

本套译丛于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始策划和组织出版，并邀请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的华世平教授担任译丛总主编，他对部分原著的推荐、译者的选择以及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十分感激！参与本套译丛翻译工作的译者大多是本领域的学术骨干和中青年专家，都具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有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政治学系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本套译丛的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校工作还存在些许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大学出版社
2012年5月

致 谢

本书是乔安妮·福克斯·普热沃尔斯基 (Joanne Fox Przeworski) 和迈克尔·布拉威 (Michael Burawoy) 两人共同策划的结果。大约在八年前，他们觉得已经听了我讲的足够多的内容，认为我应该把我想让他们确信的所有东西写下来。此后，幸运继续与我相伴。约翰·斯普拉格 (John Sprague) 和迈克尔·沃勒斯坦 (Michael Wallerstein) 与我合作研究问题，这些问题仅靠我自己是无法处理的。多年来，约翰·考茨基 (John Kautsky) 和菲利普·施米特 (Philippe Schmitter) 一直不同意我曾让他们阅读的几乎每一个词语。我对相同观点翻来覆去地斟酌，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简·詹森 (Jane Jensen) 和厄里克·俄林·赖特 (Erik Olin Wright) 一次又一次逼着我寻找新观点和新资料，就是为了说服他们。我也受益于下列人士所表达的兴趣、建议和异议，他们是戴维·亚伯拉罕 (David Abraham)、艾克·巴尔布斯 (Ike Balbus)、皮埃尔·比恩鲍姆 (Pierre Birnbaum)、费尔南多·科尔特斯 (Fernando Cortés)、乔·埃尔斯特 (Jon Elster)、约斯塔·埃斯平-安德森 (Gösta Esping-Anderson)、J·戴维·格林斯通 (J. David Greenstone)、道格拉斯·希布斯



(Douglas Hibbs)、伊丽莎白·捷琳 (Elisabeth Jelin)、伊拉·卡茨内尔森 (Ira Katznelson)、马克·凯瑟尔曼 (Mark Kesselman)、诺伯特·莱希纳 (Norbert Lechner)、玛格丽特·列维 (Margaret Levi)、柯林·利斯 (Colin Leys)、吉勒莫·奥唐纳 (Guillermo O'Donnell)、列奥·帕尼奇 (Leo Panitch)、约兰·特尔本 (Göran Therborn)、厄内斯特·昂德希尔 (Ernest Underhill)、耶日·维亚特尔 (Jerzy Wiatr) 和莫里斯·赛特林 (Maurice Zeitlin)，并且，我确信，我还受益于许多其他人士，他们的思想是如此彻底地融入我的著作，以至于我无法说出其来源。

如果说我敢于把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甚至交付印刷，使之客观化，这完全是因为我有机会首先在我的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和同事中检验它们。任何经受了这种严酷考验的人都不会再惧怕什么。

同样，我还要感谢一些机构。本书的几个章节是在国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OC75-17906、SOC78-04595 的资助下完成的。在不同时期，芝加哥大学给了我公休假。最后，近期的修改是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的资助下完成的。没有它们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诸多反馈。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够被当作反复讨论中的新一轮开始。

第 1 章是一篇论文的扩展和修改版，这篇论文最初于 1980 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第 122 卷上。

第 2 章是最初发表在 1977 年《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 第 7 卷第 343~401 页上的一篇论文的修改版。附录部分，是以发表在 1982 年《政治与社会》第 11 卷第 289~313 页上的一篇题为“约翰·罗默的伦理唯物主义”的论文为基础的。

第 3 章是和约翰·斯普拉格共同为本书原创撰写的。

第 4 章是一篇论文的修改版，这篇论文最初于 1980 年发表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第 1

致 谢

卷的第 22~66 页。

第 5 章的部分内容以“物质利益、阶级妥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为题，载于《政治与社会》1980 年第 10 卷第 125~153 页。其他部分是与迈克尔·沃勒斯坦共同撰写的，以“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冲突的结构”为题，最初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2 年第 76 卷第 215~238 页。

第 6 章是与迈克尔·沃勒斯坦合著的一篇论文，原载于 1982 年《民主》第 2 卷第 52~68 页。

第 7 章原载于《政治与社会》1982 年第 11 期第 289~313 页。

引言

这是为了不重复过去的错误：突然间复苏的对于社会民主的同情态度，是对于从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汲取教训的一种迫切需要的回应。在经过了几十年鸵鸟式的、不敢正视现实的分析之后，一些基本事实最终得到承认。社会民主成为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组织的流行旗帜。改良主义政党赢得了工人的支持。或许赢得的更多：无论如何，社会民主是唯一能够展示有利于工人的改革记录的左派政治力量。

从社会民主经历中可以学到什么吗？正如多年来的简单拒绝的态度所表明的，答案绝非显而易见。人们可能拒绝选举替代品，就像各种各样的革命左派一百年来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少数派发动的起义遭到拒绝——不管是因没有可行性，还是因为这并不能带来社会主义——那么，社会民主就会成为唯一可以寻找教训的历史实验室。重复历史错误的代价不能忽视：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

但是，“错误”是什么？犯错误的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在预设了一个政治方案即某种策略选择的同时，也预设了独立于特定运动的客观条件。如果一个政党的策略的决定因素是独一无二的，那么“错误”的概念就没有意义：这个政党所能追求的，都是不可避免地会发



生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 1891 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评论中写道：“我们认为现行社会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使受压迫阶级反抗私有制的条件。”（1971：90）社会主义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且政党本身也必然是因果链条中一个被决定的环节。普列汉诺夫（Plekhanov）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明确的阐述：“社会民主党从必然性的立场看待历史发展，它自身的活动也是那些必要条件中的一个必要环节，那些条件结合起来，使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1965：vol. XI，77）在这种历史模式中，经济因素被认为同时决定了革命的条件和这些条件下人民的行动。政党的活动因而是被预先决定了的。这就没有了错误的存身之处。在一个必然性的世界，错误问题甚至难以被提出来。

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错误这个概念，也是在一种关于历史可能性的彻底唯意志论的理解背景中被毫无意义地提出来的。社会民主的批评者常常采用一种唯意志论的立场。对他们而言，苏维埃革命摧毁了历史的宿命论模型。既然一场革命在经济条件并不“成熟”的地方发生了，那么，它就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发生。因此，卢卡奇（Lukacs）在 1924 年的著作中断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预设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现实”，客观条件“不是仅仅已经‘成熟’，甚至已开始变得有些腐烂”（1971：11–12）。托洛茨基（Trotsky）在 1938 年指出：“现在，一切都依赖于无产阶级，即主要依赖于它的革命先锋队。人类的历史危机简化为（reduced to）革命领导的危机。”（Claudin, 1975：79）霍克海默（Horkheimer）1940 年沮丧地说：“现在对不充分条件的谈论，是在掩盖对于压迫的容忍。对于革命者而言，条件总是成熟的。”（1973：11）但是，如果一切总是可能的，那么，仅仅动机就可以解释历史的进程。因为错误是方案和条件之间的关系；当且仅当在现存条件下推动一个既定方案实现的过程中，一些策略无效而同样条件下其他策略却有效时，错误才可能发生。如果一切皆有可能，那么策略选择就只是一种意愿而已；目标的

选择本身也同样如此。因此，传记因素（biographical factors）成为理解社会民主的关键。麦克唐纳（MacDonald）饮国王的茶上了瘾，成为他背叛的理由；对于活动的理解简化为对于欺骗、丑闻和背叛的揭露。在一个不受客观约束的世界，“背叛”成为理解社会民主策略的合适的方式。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对于背叛的指控并不那么具有启发意义。

尽管偶然事件可能是历史的原动力，但是，有那么多工人的政治领导人可能是碰巧成为“背叛者”，还是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如此，克劳汀（Claudin）仍正确地观察到：“这种解释引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们追随这些‘背叛者’领导人？”（1975：56）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正如阿拉托（Arato）所指出的：

一种根本不能够穷尽并且部分篡改了卡尔·马克思理论设计的理论版本，试图表达产业工人阶级——所有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都不可避免地被划入这一社会阶层——的直接利益……阐述当下的客观可能性与被解放的未来之联系的实践哲学，几乎总是不与政治相关。（1973：2）

无论是“意识形态统治”还是压迫，都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组织和行为方式。工人阶级不可能永远受骗上当，也不是被动的牺牲品。实际上，工人组织了工会，并且在多数国家组建了政党。这些组织有其自身的政治方案，它们选择并从事于各种策略，直到成功或失败。尽管工人阶级自身是资本主义关系所锻造的，但却是变革资本主义的一支积极力量。除非我们在工人自身的利益和行动中寻求解释，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适应力。

如果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不能假定政治运动的实践完全是由任意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也不能假定政治运动独立于它们试图变革的条件，可以任意而为。这些条件在每时每刻都构成了选择的结构：行为者在这个结构中盘算目标，察觉替代性选择，并对它



们进行评估，选择行动进程，并且循此创造新的条件。

任何寻求变革历史条件的运动都是在这些真实的条件中进行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并且面临来自这个特定社会组织的明确选择。这些选择具有三重性：(1) 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制度内，还是在现存制度外去寻求促进社会主义；(2) 是排他性地在工人阶级内部寻求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原动力，还是依赖多阶级甚至是非阶级的支持；(3) 是寻求改良、部分改善，还是竭尽全力去彻底地废除资本主义。

这些选择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尽管参与的问题只是当作故事的开场白简单地加以讨论，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策略问题，都将被系统阐述和实证地分析，并被应用于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本书尽管是一部写作时间跨越六年的文集，但其中心集中于分析两个重要的主题：(1) 在选举竞争过程中，社会主义政党被迫削弱工人组织的阶级性；(2)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经济议题上的妥协是可能的，有时甚至优先于更为激进的策略。这两个假设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过去是，并且继续是通过多阶级取向的、经济上奉行改良主义的选举性政党组织起来的，无论它们贴上什么标签，这些政党都是“社会民主”政党。同时，这些假设也意味着改良并不是不可逆转和不断累积的，因而为批判社会民主提供了基础。

本书第1章“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民主”，为全部分析提供了总的理论和历史框架。接下来的两章分析了政党在把工人组织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2章“无产者成为阶级：阶级形成的过程”，评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形成过程的历史文献。其核心观点是，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应当被视为由于不断冲突带来的偶然的(*contingent*)历史产物，在此过程中，阶级得以组织、分裂和重组。这一理论路径在第3章中也被用来分析选举性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以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这些策略对于七个欧洲国家个体工人的投票行为的影响。分析表明，社会主义政党在追求选票和把工人

组织成为一个阶级之间面临着选择；对于社会主义变革（transformations）而言，压倒性的任务不是为了选举的可能结果而不顾政党采取的策略。

其后三章专注于讨论民主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面临的经济策略选择问题。第4章“同意的物质基础”，提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诸要素，它们构成了工人的有效选择的条件。这一章提出了分析策略问题的总的理论框架。第5章要论证的观点是，在有些情况下，对于追求物质福利最大化的工人而言，向资本主义产权形式持续存在作出妥协是有利的。尽管社会主义在满足物质需求方面更具有优越性，但是投资收缩（disinvestment）的威胁可能阻止了工人对于过渡（transition）策略的支持。第6章强调，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制和政治民主的结合是一种妥协的结果，该章还强调了当前右翼的攻击带给民主的威胁。

最后一章回顾了构成全书基础的理论原理。在与约翰·罗默（John Roemer）提出的剥削和阶级理论的争论中，这一章对未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陈述。最后，本书的附录回到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和社会民主的变革能力的问题上来。

本书来自一个折磨人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被放弃的各种可能性正隐藏在我们日常经历的幕后的某个地方。要研究这些可能性，必须重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选择逻辑；它必须重建作出每一个选择时所被开启和封闭的历史可能性，并且找到过去的哪些决定限制了我们现在的选项。

这些任务要求一种特殊的方法论。在这里，社会关系被视为作为历史行为者的个人和集体在每个历史时刻作出可行选择的结构，并且反过来，也是早些时候某些政治力量所采取的策略的结果。因此，行为（behavior）被当作策略行动（action），它以目标为导向，以权衡盘算为基础，是对可觉察的各种备选方案作出的回应，来源于决策。有些备选方案相当清楚，至少在回顾时是这样——以至于它们能够借助于数学模型加以分析。选举策略和经济策略都是如此。有些其他选



择虽然非常易于理解，但是，无论对于涉及其中的行为者还是观察者而言，却难以计量，因为备选行为过程的结果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但是，还必然存在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特别是在今天，左翼似乎不仅丢掉了其作为解放力量的承诺，甚至失去了其作为下一次选举的候选对象的独创性。要说没有其他可能性，这仍然是让人难以相信的。正是为了揭示这些被放弃的可能性，我们才有必要回溯历史。